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大门，迫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中国面临着一个危与机并存的特殊历史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消散，学习西方思想开始兴起；政治方面，各阶级先后登场，进行改革或变革的尝试；经济方面，工业化浪潮不断涌动。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重农思想根深蒂固，但近代工业的发展使以工立国思想萌发出来。1900年后，一系列反映以工立国思想的著作开始出现，《申报》《东方杂志》等刊物先后刊发了《自强说》《开矿说》《论中国工业之前途》《中国宜求为工业国》等文章，宣传以工立国思想。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进行了长期争论，影响深远。

三次讨论高潮

1920年代爆发了讨论的第一次高潮。1912至1919年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工立国思想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以及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也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工业化，进而在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和深化以农立国思想。这一时期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1923年11月他在上海《新闻报》发表《农国辨》一文，批判以工立国，阐述中国需要坚持以农立国的原因。以工立国派的代表有杨铨、杨明斋等人。杨明斋的《评〈农国辨〉》一文，在列举章士钊《农国辨》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逐条反驳，捍卫了以工立国的观点。

1930年代，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显著，其中农业经济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与危机前的高峰年相比，1934年农业所得下降31%，工业所得下降5.9%。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争论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完全对立的，两派的争论聚焦在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先后顺序上。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漆琪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等著作或文章中，主张优先发展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带动工业发展。以工立国派则以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提出的“发展都市以



救济农村”“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吴知《中国国民经济的出路》等著作或文章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全盘推进工业化，工业化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

1930年代末40年代初，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何以建国的问题又在知识界争论起来，形成了争论的第三次高潮。以农立国派以杨开道为主要代表。周宪文、许涤新则是这一时期以工立国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进一步发展出能够兼容两派之长的理论成果。翁文灏在《以农立国，以工建国》一文中吸收各家所长，提出工农业不可偏废的思想。戴星如在《战后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中提出工农并重思想，认为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同样不可忽视，这些观点表明知识界对工农业关系问题的理解又有所发展。

争论各派的主要观点

以农立国派。（一）农业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优于工业国。农业国具有讲节欲、尚清静、重礼仪、尚简等优秀精神文化品质。（二）农业国在独立性方面优于工业国。一者，工业国往往依赖国外市场和原材料，而农业国则可以

实现自给自足。二者，中国成为工业国必然要增加与外国的交往，在交往中容易进一步被其他国家控制。（三）从世界格局上看，中国不宜成为工业国。世界上工业国过剩而农业国不足，成为工业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四）中国不具备成为工业国的现实基础。中国想要成为工业国对内需要强大的工农业基础为工业化提供支撑，对外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应对与其他工业国的竞争。（五）工业国在安全方面不及农业国。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危机都是工业国引起的，发展工业会导致战争、经济衰退、贫富差距过大、劳动者生活悲惨等严重后果。（六）中国国情适合以农立国。中国气候适宜、地大物博、土壤肥美，农业国传统悠久，人们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符合农业国特性。

以工立国派。（一）以工立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措施。其一，工业立国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其二，以工立国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要发展民主政治需以工业化国家为基础。其三，以工立国对推动科技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二）以工立国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工业和农业是相辅相成的，工业促进农业技术、交通运输发展，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三）以工立国符合历史发展规

律。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从农业社会发展

到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也不例外。工农并重派。（一）肯定工农业的重要地位。农业国传统、农民比重大、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占比大，中国必须重视发展农业。加强国防、争取抗战胜利、提高文明水平、增进人民福祉、跻身世界现代国家之林，要求中国必须重视发展工业。（二）工业农业相辅相成。农业想要发展必须依靠工业，从而更新生产方法和技术。工业发展也要依靠农业，农业在经济、劳动力等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保障。（三）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二者不可偏废。仅仅以工立国会导致“市场”和“农产品”都依赖其他国家，使中国不得不依附世界市场，经济独立性丧失。仅仅以农立国则会受到农业生产有限性限制，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和资本，也无法在现代化国防建设和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

争论的历史启示

知识界对于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前后绵延近五十年，经历了萌芽期和三次高潮，其理论呈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由空洞到具体的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表现出



马雄冠的“内迁报国”之路

□ 陈 亮

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马润生（1871—1945）在20世纪20年代敏锐地发现，国内制造工业所用的粉状原料绝大部分由国外进口，磨粉工业还是以人工动力居多，有一二家采用所谓新法，也只是一种不健全的尝试，因此磨出来的粉末，品质既不纯净，细度又难划一，不能适应各种新兴工业的需要，由于大多数工业原料受人牵制，发展阻力很大。

艰辛创业。1925年，马润生在上海创办顺昌石粉厂。1929年，马润生的长子马雄冠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进入顺昌石粉厂工作，担任工程师，负责管理石粉厂的机器设备。马雄冠自幼跟着父亲学习，目睹了父亲创业的艰辛和不易，继承了父亲爱国报国之志，终身以“实业救国”“工业救国”为理想。虽身在豪富之家，但马雄冠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丝毫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奢靡之风，他生活简朴，为人方正，工作勤奋踏实。马雄冠担任石粉厂工程师后发现，随着石粉厂规模逐渐扩大、机器逐年增加，磨损程度也相当惊人，急需配套检修。

1930年，马雄冠依靠石粉厂，将机修车间发展为铁工厂，定名顺昌铁工厂。自此，在马雄冠的苦心经营下，顺昌铁工厂开始自主生产机械设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营机械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大都以修配为主。但顺昌铁工厂拥有大量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在马雄冠的领导下专攻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并博采众长。马雄冠雇佣现代产业工人，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经过数年锤炼，顺昌铁工厂已能设计制造出复杂机器，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具备高技术实力的机械制造企业。

1936年3月6日，顺昌公司在申报上发布《上海顺昌机制石粉厂顺昌铁工厂启事》，正式宣告承制机器业务。这标志着顺昌铁工厂经过马雄冠和设计师、技术工人数年艰辛努力，已经初具规模。此时的马雄冠雄心勃勃，准备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开始建造钢结构的金工车间。但1937年日军突袭上海，顺昌铁工厂遭到重大打击，不仅金工车间未能建成，更要命的是铁工厂不在租界内，被迫停工。

内迁先锋。马雄冠在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策划搬迁事宜。国民党当局号召上海工矿企业内迁时，马雄冠积极响应，主动将顺昌铁工厂

内迁到大后方，生产支援抗战的军用物资，补充后方的民用供给。在马雄冠的引领作用下，一批上海企业纷纷踏上内迁的路途。

1937年沪淞保卫战打响，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为保存抗战实力，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工业企业内迁序幕正式拉开。它深刻改变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地域布局，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甚至有人称它为“中国工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其中马雄冠领导的顺昌铁工厂是上海第一家内迁企业，也是机器工业中的重要企业。

马雄冠是坚定的爱国者，动员内迁时，自己的利益早已置之度外。他认为既然拥护抗战，就必须把可能陷入敌的工厂迁到后方。第一步目的在于避免养敌，第二步目的是希望增加后方生产，加强抗战的力量。

1937年8月22日，顺昌铁工厂首批机器零件在日军的炮火硝烟中“冒险用民船划出，取道苏州、武进而至镇江转船拖至武汉”。“8月27日，21艘木船装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以及顺昌铁工厂和上海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职员、家属及160余名技工，在各厂重要职员高功懋、刘元文、邵仁理、金祥宏等分别率领下，冒着敌人炮火由苏州河率先驶出，走上内迁的征途。”

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跋涉，10月中旬，顺昌铁工厂由上海迁出的机器设备陆续到达武汉，四批物资共17条木船，由高功懋、孙孝儒、瞿世范等人领队，随迁工人45人，内迁343吨物资均奇迹般地安全到达武汉。

马雄冠不顾舟车劳顿，在硤口租厂房紧急装机复工，为抗战生产军需紧急物资，内迁人员不顾水土不服，夜以继日地赶制南京兵工署所需车床。

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日军经常轰炸汉口，汉口也成为了抗日前沿阵地，军用物资必须要保证。在得到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借款协助后，1937年12月7日，马雄冠率领重庆铁工厂再度内迁，首批机器零件脱离汉口，一部分于12月20日抵达重庆。12月，到达重庆的有工人45人，物资约200吨，其中有车床11部、搪床11部、铣床及磨床4部等设备，铁板29吨、生铁60吨等原料，炸弹壳等机器产品。大批物资、人员的远程搬迁，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精力和时间作系统规划，这番“折腾”给顺昌铁工厂带来了巨大创伤，极大削弱了制造实力。不幸中的万幸是，重要的机器设备完好

地保存下来。但在第二次迁移中，顺昌铁工厂接受军事任务，为重庆炼钢厂从汉阳钢铁厂抢搬了约500吨的大型设备，为了抗战，马雄冠放弃运输顺昌铁工厂的部分物资。令人悲痛的是，在迁移途中5名技术工人不幸牺牲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截止到1938年9月15日，顺昌铁工厂到运物资262.1吨，到达工人47人，这些都成为后来抗战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力量。

抗战脊梁。顺昌铁工厂在内迁过程中曲折艰辛，危机重重。在马雄冠的领导下，顺昌铁工厂的员工誓死不当亡国奴，“大家为了抗日，没有一个人喊冤叫苦”。马雄冠及其员工深知机器装备在国家军事竞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怀着工业报国、机器建国的理想，不畏艰险，敢于抗争。马雄冠更是展现出一个爱国企业家实业救国、勇敢精干的精神。上海西区沦陷后，“马雄冠不顾危险，由镇江返回上海，拆运第二批机器和原料，当第二批木船离开厂区，就不能再通行”了。

顺昌铁工厂内迁到重庆后，改组成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铁工厂，以支援抗战为宗旨，以制造机器为己任，努力实现“工业报国”。在抗战期间，马雄冠和大多数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建立先进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组织先进机器等手段，逐渐成为大型的民营机器制造企业，生产出各种机器和军需产品，为大后方提供各种设备，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真正成为民族的脊梁。

但是，从1944年底到抗战结束，由于国民政府腐败，通货膨胀严重，工矿企业普遍衰落。顺昌铁工厂也难逃厄运，举步维艰，出现严重亏损，不得不宣告停业，遣散工人。但是，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时刻，马雄冠和顺昌铁工厂的员工用自身行动践行了实业救国的志向，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以民族独立、支援抗战为目标，始终将国家利益、民族安危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涵，他们所走过的艰辛内迁报国之路，也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瑰宝。



（上接1版）

践行人民至上，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妇女儿童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人民至上”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位。这生动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价值底蕴及其得以实现的力量源泉，贯穿于对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为民情怀，彰显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亿万妇女儿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孜孜以求的执政理念，展现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统筹推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战略思维。

新征程上，妇联组织要牢牢把握联系和服务妇女的工作生命线，坚决扛起维权大旗，用心用情用力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源头参与上更有深度，推动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实施，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及就业、生育、老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推动落实新一周期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筑牢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制度根基；在基层维权上更有力度，推动健全和落实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持续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家庭的走访帮扶，推动对拐卖、性侵、家暴等侵害妇女儿童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惩治，强化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畅通妇女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维权工作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到基层；在关爱服务上更有温度，联合开展面向困难妇女儿童的公益诉讼、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大力推进“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健康中国 母亲行动”，持续深化寒暑假儿童关爱服务项目、低收入妇女“两癌”免费救助项目等，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妇女儿童身边；在维护妇女领域政治安全上更有强度，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勇于自我革命，以更强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风险挑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新的部署，充分体现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战略清醒和历史主动。妇联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力量。推进妇联改革，加强妇联建设，保持和增强妇联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的重要内容，是党的自我革命在妇联领域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切寄托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为妇联组织进一步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新征程上，妇联组织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妇联党的各项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走在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的最前列。聚焦突出问题改革攻坚，强化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纵深推进“破难行动”，以强根基、扩覆盖、补短板、增活力为重点，进一步夯实妇联基层组织体系，拓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中的妇联组织建设，加强对女性社会组织政治引领、示范带动、联系服务，推广“基层妇联执委大走访”等好经验好做法，健全“我为妇女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更好地为党夯实执政的妇女群众基础。大兴勤学善思之风、调查研究之风、真抓实干之风、守正创新之风，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不断增强做好妇女群众工作的本领，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